



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

丰碑

信阳地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所

★
资料室

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编



丰 碑

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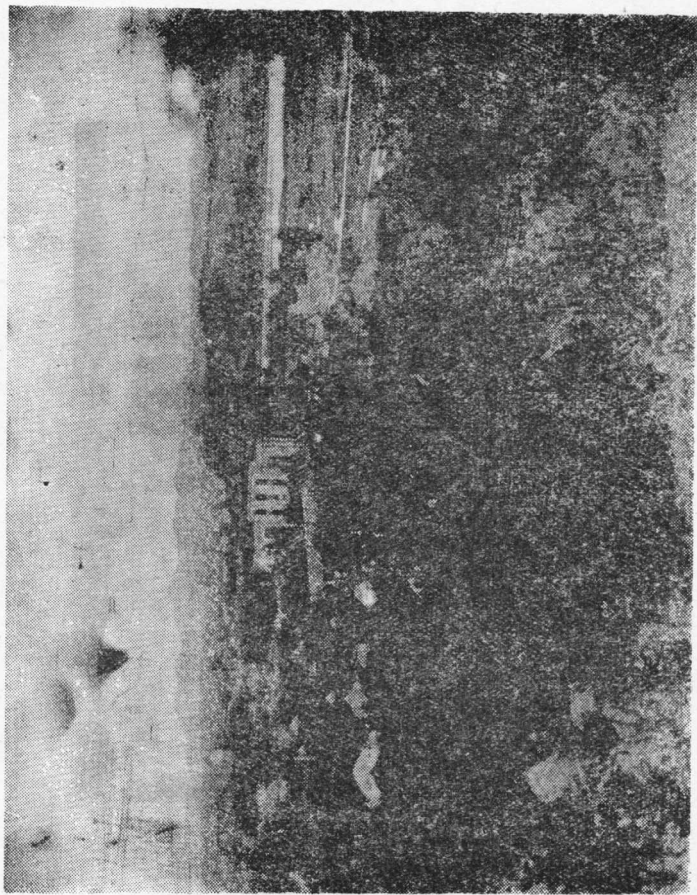
（第六辑）

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一月



白雀园殉难烈士纪念碑 蔡传玮摄



今日白雀园全景 蔡传玮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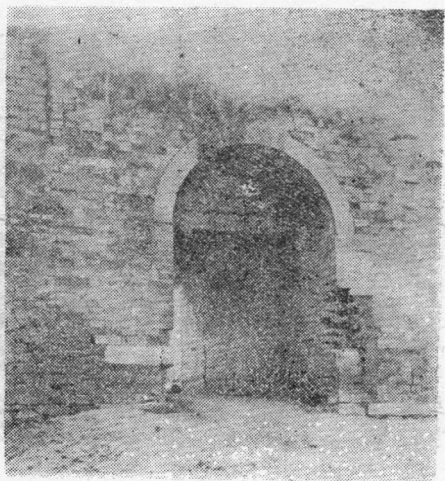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一年底，张国焘在此指挥白
雀园肃反。

蔡传玮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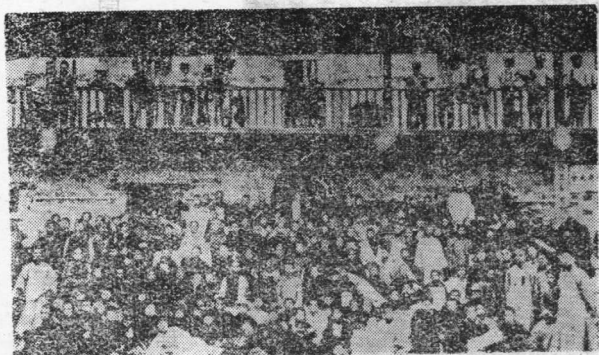


白雀园小东门——肃反时，革命同志经过这里，被杀害于门外的河滩上。

蔡传玮 摄



一九二七年，信阳县农代会在县城（现信阳市内）袁家大楼召开。这是当时的留影



一九二七年，明港农协组织会员们热烈欢迎北伐军。



目 录

热血染大别 教训留后人

——关于“白雀园肃反”情况的调查

.....陈卫山 许震环 侯玉林(1)

白雀大肃反 惨痛难卒书

——关于光山县白雀园大肃反的情况调查

.....光山县委党史办(98)

惨痛的事件 严重的后果

——白雀园肃反对固始的影响

.....固始县委党史办(108)

四望山红色区域的开创

.....信阳县委党史办(111)

光山县革命苏区根据地的创建

.....光山县委党史办(205)

土地革命初期新县农民革命概述

.....方继华 张光怀(248)

殷区农民武装起义

.....光山县委党史办(257)

周黄暴动

.....淮滨县委党史办(265)

一、二战时期信阳地区的红枪会

.....信阳地委、信阳县委党史办(273)

信阳武装农民(红枪会)暴动击败魏益三

.....信阳市委党史办(289)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息县红枪会情况报告

.....息县县委党史办(296)

热血染大别 教训留后人

——关于“白雀园肃反”情况的调查

陈卫山 许震环 侯玉林

“白雀园肃反”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间，张国焘为了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政策，实现其极端的个人主义统治，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澄清这段历史，告慰先烈、留戒后人，是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是历史赋予我们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白雀园肃反”的经过及其后果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在我们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错误路线指导下，以“改造各级党的领导”为名，向各革命根据地派遣了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机关。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根据中央决定，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此后，他利用职权进行宗派主义活动，打击迫害原在鄂豫皖苏区工作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白雀园肃反就是这一罪恶行为的典型事件。

1、以白雀园肃反为开端的鄂豫皖苏区整肃运动。

一九三一年七月，为了支援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红四军南下作战。在徐向前、曾中生、许继慎等大批军事将领的指挥下，坚决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军事路线，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军事胜利，而这些却被张国焘视为眼中钉。他借口红四军领导同志违犯分局命令，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信强令红四军从前线北返，并派陈昌浩于九月十三日赶到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撤销曾中生同志的红四军政委职务而代以自任。之后，红四军继续北返，途中先后逮捕了许继慎、周维炯等二十多位红四军的师团级干部。九月下旬，部队集中於光山县东南白雀园一带（东北至河凤桥、西北至砖桥、西至浍河、东南至余集），张国焘从中央分局首府新集亲自赶往白雀园，坐阵指挥这次以军队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大肃反。

“为了防止大肃反中部队发生异动现象，在大批逮捕人之前，先进行了各师的混编。各师、各团、各营，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分局、省委并组织了巡视团，分派到各师帮助进行肃反工作”①，设置保卫局，是为了“保卫部队和政权机关，以肃清反革命的破坏工作”②，但张国焘却把它凌驾于各级党组织之上，“根本不走群众路线，大搞保卫局独裁，甚至派出特工人员侦察、监视党的高级干部，党政军负责同志稍一失言，即被逮捕”③。在肃反中，保卫局滥用权力，草菅人命，使用捆绑吊打、坐老虎凳、踩杠子、灌辣椒水、手指钉钉等数十种酷刑，摧残革命同志，许多人被严刑逼供、苦打成招，供了就捕，捕了又逼。在这种所谓“展转招供”之下，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两个战士见面讲话，就会被当成“改组派”，团支部开会指为“改组派开黑会”，菜不够吃，被指为“改组派的吃菜队”吃的④；战士

买烧饼充饥，被说成是“改组派的吃喝委员会”；男女战士谈话或干部找女战士谈心，被说成是“改组派的恋爱委员会”⑤。结果，这次大肃反“几乎把参加领导黄麻、商南、六霍起义，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同敌人血战中久经考验的干部，以所谓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罪名，都无辜地加以杀害了”⑥。

于白雀园在红军中进行大肃反后，张国焘又把这一罪恶的肃反，扩展到鄂豫皖苏区的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中去。他们以“改造党”、“改造苏维埃”为借口，进而主张在“两条路线（反‘左’与反右）的斗争中贯彻肃反”，“从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中发现反革命的线索”⑦。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排斥异己的罪恶肃反。

一九三一年十月底，中央分局指示各县“要加紧肃清反动，彻底消灭国民党在苏区内部组织反动力量，影响外面进攻走漏红军消息的阴谋”（见附件1）。十一月十七日，陈昌浩在《肃清改组派、AB团、第三党》一文中说：“地方反改工作还刚刚开始，……彻底肃清改组派、AB团、第三党是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见附件2）。他们不仅要“改造党”，而且还要“改造青年团，发动团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要改造苏维埃，要改造贫农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⑧，说“工会的领导机关混进了非阶级成份以及反革命分子”（见附件3）。

在张国焘错误的肃反政策指导下，各县的大肃反相继展开。光山县：县委机关一百余人，除几个警卫和炊事员外，全部被抓走（见附件4）；县政治保卫局局长带着一位秘书，一夜讯案三十二人。到半夜时，保卫局长睡觉了，就由

秘书代审。第二天清早，局长看了一下记录，就决定杀十六人⑨；保卫局特务营的人都配有短枪，专门抓人，最多的时候抓了几千人，丁李湾一次就向保卫局送了一百多人；白雀园镇东门外的河滩里，在大肃反中杀害的不下千人，还把许多人送到镇西沙石岗的大洼地里去活埋；弦南区区委苏机关一次就带走五十人。（见附件4）赤南县委机关，四十八个干部，除一个事务长、两个勤务员外，全部被杀⑩。据解放后商城县七个区一百零一个乡的调查，肃反中被害者达四百零九人⑪。据固始县陈淋乡的不完全统计，肃反时被杀的干部有姓名有职务者就达七十余人（见附件5）。信阳特委是长期受党中央领导的机关，和鄂豫皖苏区关系密切，“肃反把特委委员杀得一个也没有剩下来”⑫。六安县委机关除剩下两个炊事员外，书记、县苏主席、常委全部被杀；霍山县委机关干部一百九十余人，霍邱县委机关干部二百余人，也全部被杀；英山县苏十一个委员，有十个被杀，一个因出差不在才得以幸免⑬。

地方武装肃反也搞得非常厉害，彭杨军校一次就逮捕了所谓改组派分子四十九人。罗山县独立团班以上干部在肃反中被一次杀完。光山独立团排以上干部几乎也被杀光（见附件4）。霍山独立团从团长政委到战士二百多人全部被杀⑭。英山独立团的一个连一百余人，与敌人打了一天仗，夜晚集中在英山河滩上被集体杀害⑮。

综上所述，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杀害的红军将领和党的领导干部是数以千计的，至于广大的战士群众无辜被杀者，就难以数计。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说，这次肃反“被捕者约六百人，军人占三分之一；实际整肃的有

许继慎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三十余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余人”⑩。陈昌浩也说：“这次共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一千五、六百人”⑪。实际数字绝非如此，徐向前、倪志亮回忆说：“在这一主观主义的逼供性的肃反中，红四军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幸免者外，几乎都一网打尽了……。三十团在大肃反中，被残杀的班以上的干部，估计共约五百人上下。其他各团，并不少于三十团。这些被捕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几个放出未杀，或仍回军队工作外，一般的都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杀害了”⑫。由此可知，红军主力四个师的十二个团，肃反中被害的就有六千人左右。据有关文献记载和老同志回忆，有姓名有职务的部队团以上和地方县以上干部被杀害者就有近百人，其中军师级干部就达三十余人（见附件6）张国焘的肃反政策“发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四方面军中的一些忠于革命的干部，谈及国焘的肃反政策无不泪下”⑬。徐向前、倪志亮悲痛地追忆到，这次肃反“把许许多多的苏维埃和红军的创造者，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与敌人血战中久经考验过的干部，竟以反革命的罪名——改组派、AB团、第三党而肃掉了，使这些优秀的共产党的骨干含冤地下久而莫伸，其惨痛真令人不能卒书，其罪恶也令人难以笔墨形容”⑭。

2、白雀园肃反对鄂豫皖苏区的恶劣影响。

白雀园肃反对鄂豫皖苏区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以及根据地的巩固，都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第一，最为突出的是造成了根据地的干部十分缺乏。陈昌浩在彭杨军校作的关于此次肃反详情的报告中说：“现在

红军中军政党团的干部全部改造了”^{②①}。一九三二年初沈泽民向中央报告说：“干部问题，在苏区目前则是极严重的”，迫切要求中央派来六个师长，二十个左右的团长和大批政委及参谋人才^{②②}。一九三三年初，沈泽民又向中央写信说：“干部的缺乏的确是一种严重的情况，目前鄂东北、皖西北不论哪一方面，假定再能少一两个干部，即会使工作发生严重损失”（见附件7）。肃反在广大干群中造成严重的恐怖心理状态，“有些干部受了严刑，处分后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所以有些人不愿当干部，怕当了干部犯错误”^{②③}。罗山独立团在干部被杀完之后，由上面派来的巡视员将战士集中，站在队前相干部，相中了谁，就当面任命为营长、连长、排长和班长^{②④}。

有文化的干部尤其缺乏。常毅同志回忆说：“张国焘在部队和地方大量逮捕和杀害的人，绝大部分是革命初期有文化的领导人”，结果“在部队中一个连要找一个能写点口令搞点统计的人都没有”^{②⑤}。“人们不愿学文化，怕变成知识分子，已经上过学的，也装着是文盲，因为在当时知识分子最容易被看成是阶级异己分子”^{②⑥}。鄂豫皖省委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诉说了没有知识分子的窘境：

“鄂豫皖省委也没有专门的秘书，一个简单的信条子，都是书记自己写。地方县委中多数是政治文化水平很低。全苏区没有一个文句写得清楚的秘书，有的游击队和区委无一人识字，有的游击队连写账的人都没有”。

第二，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滋长和蔓延了家长制作风。张国焘把中央代表的职权发展成了家长制，这种恶劣的作风，对苏区各级党政军组织影响很大。不论是军队或地

方，“上级对下级也没有民主可言，都是上面说了，下面无条件执行，平时稍有反对意见，就说你是对抗命令，因此造成部队的自由主义小广播严重，当面敢怒不敢言，背后骂娘发牢骚。也造成了下级干部的很大盲目性，遇事偏听偏信，感情代替政策”^{②7}。何干之在《张国焘路线和党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一文中说：“张国焘在军队中不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而是愚民政策。不许下级干部提领导的缺点，从未用党的政策、路线、纲领去教育干部，提高他们的思想政策水平”。造成了军阀主义的个人专制和盲目服从的风气。

第三，在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上留下了沉痛的伤痕。白雀园肃反，使广大战士和人民群众迷惑不解，精神苦闷，革命积极性遭到严重挫伤。人们多不愿入党，怕肃反中被打成第三党，已经入党的，在转党的关系时，隐藏起组织介绍信不交，因为在肃反时支书被抓，全支部党员受牵连，所以大家都害怕。

地方党政领导机关一度陷于无人过问的瘫痪状态，六安县委、赤南县委的工作都因干部被杀太多而一度中断。英山县苏维埃政府，原定于一九三二年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也因无人组织和出席只好作罢。在第四次反“围剿”的紧张阶段，敌人已经逼近黄安外围，还无群众自动向红军报告消息，致使红军作战被动^{②8}。这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遗患于后来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林维先同志回忆说：“张国焘肃反的错误，一直影响到沈泽民乱杀人，影响到高敬亭还是乱杀人，这是很严重的”^{②9}。据徐海

东将军生前回忆，在“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重要领导人，在肃反问题上，仍受着张国焘肃反路线的影响，坚持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一九三二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鄂豫皖苏区还进行四次较大规模的肃反”（见附件8）。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二十五军奉命长征后，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战斗。高敬亭又在部队中进行了三次集中的大肃反。红二十八军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受到牵连，大批党和红军的干群惨遭杀害^{②0}。

第四，肃反映及其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伟大的肃反胜利，使鄂豫皖苏区和红军得到了巩固和空前的发展”（见附件9）。张国焘自己吹嘘说：“这一肃反比富田事变所得经验还大，可以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②1}。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央致信皖西北中心县委说：

“最近鄂豫皖肃反的深入，给予敌人在苏区破坏革命的阴谋以致命打击，这自然是革命的伟大的胜利”。“研究和学习鄂豫皖肃反的经验与教训，广泛的在党内党外宣传反革命的一切破坏革命的阴谋与罪恶，要成为你们目前的一切工作中不可分离的工作”^{②2}。这一指示发出后，不少根据地仿照鄂豫皖的做法进行肃反。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报告中央说：“伟大的肃反胜利，使鄂豫皖苏区和红军得到了巩固和空前的发展”（见附件9）。这年秋天，他们按照张国焘在鄂豫皖肃反抓“改组派”的办法，开始大规模肃反，逮捕党政军干部千余人，几乎全部杀害^{②3}。据贺龙同志回忆说，在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中，错杀革命志士达万人。

赣东北以鄂豫皖苏区肃反后打过胜仗为由，提出了“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的口号，致使肃反恶性发展。从赣东北到闽北，从军队到地方，由下级到上级，由机关到农村，到处都掀起肃反的浪潮，无数革命群众，许多群众领袖和革命干部，都在肃反中含冤而死^{③4}。

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后，张国焘继续推行肃反政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有两万余人惨遭杀害^{③5}，其中三十三军的三百多名青年干部也无辜被杀^{③6}。

二、张国焘的大肃反缺乏事实根据

张国焘等人一再肯定在鄂豫皖苏区存在着“改组派”、“A 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组织，并以此为借口进行了大肃反，杀害了大批的红军将领和革命干部。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张国焘在《关于反二次‘围剿’及其他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这一苏区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改组派就是当地富农、地主的一个集团，他们利用苏区的困难和我们的缺点来造谣，反对苏维埃政府。”六月三十日，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中说：“要加紧肃清改组派的工作，肃清改组派的影响”。十一月二十五日，又在《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的原因》的报告中说：“民团侦探、蒋介石及苏区周围各军队派来之侦探、改组派、A B团、第三党在许多实际活动中已充分证明联成一气”。“由于皖西反革命之特别多，几乎各级指导机关都充满了反革命”。陈昌浩也说：“过去红四军